

政治哲學要跨出去！

論台灣政治哲學研究的發展趨向

黃 默* · 陳俊宏**

- 一、前 言
- 二、西方政治理論的復興
- 三、政治哲學與政治實踐
- 四、台灣政治哲學研究的發展現況
- 五、台灣政治哲學研究的困境
- 六、對未來發展的幾點建議
- 七、結 論

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政治思想領域在英美世界快速的發展，除了「新政治思想史」的出現取代傳統對經典作品的研究以外，政治理論的學者也在從事巨型的規範性政治理論的建構，並對政治現實重大議題的哲學性反省上貢獻良多。長期以來，台灣政治思想領域的發展和英美政治學界的關係相當密切，然而上述西方政治哲學的發展趨勢，並未顯著地反應到台灣政治思想領域的研究作品中，學者仍著力在對西方思潮的引介上。隨著學術專業化分工日益細密，政治思想領域研究也出現研究範圍日益窄化，研究取向脫離政治現實，以及各次領域之間彼此無法對話的現象。本文主要目的是對本學科的發展做初步的反省，透過瞭解西方政治思想領域的發展，進一步分析台灣當前政治思想領域的現況及所面臨的困境，進而主張政治思想領域研究者應該擴展當前的研究範圍，除了對思想家作品的詮釋外，應該多方面從事對政治現實以及公共政策的哲學性反省；同時也可針對某一議題嘗試和其他政治學門次領域或非政治學領域的工作者共同研究。對內整合政治學門各次領域的知識貢獻，對外從事跨領域的研究。最後本文也對政治思想領域的研究方向，提出幾項可供未來發展的建議。

關鍵字：政治哲學、關聯性、活力、公共事務、審議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專任教授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專任講師

東吳政治學報/1997/第八期/頁1-45

一、前言

「我們為什麼要念西洋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和政治現實有什麼關係？」作為一個政治思想領域的研究及教學者，這些是我們經常被問到或自我反思的問題。理論家從不同的立場出發，對此問題的解答可能有許多種，尤其在政治理論經過不同學派衝擊及洗禮後的現在。有些學者主張從事政治理論的目的在於理解政治生活的本質；或者解釋至今影響人類政治思考深遠的政治經典（*canon*）；或者訓練我們的學生關於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的歷史與方法，並鼓勵學生質疑或改變學院中對政治思考的種種預設及前提。有的則主張政治哲學的目的在於釐清政治語言的意義；有的則主張政治理論的任務在於改造世界。有的甚至認為在當今民主憲政之下，政治哲學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即是去呈現一種政治性的正義觀。這些不同的看法本身也就預設了作為一個政治理論的工作者，對於政治理論的研究性質以及自己角色扮演的認知。這是一個攸關學科性質與範圍的嚴肅問題，須要謹慎地來處理¹，尤其對於台灣地區的研究者而言。長期以來，台灣政治哲學的研究一直受到國際學術界發展的影響，尤其視知識傳授者本身受到何種思潮的影響，因此不同時期也就呈現出不同的學術潮流及學術生態。本文的目的即是希望透過探索西方政治哲學近二十年的發展趨向，來檢視當前台灣政治哲學研究的狀

-
1. 在西方關於此議題的討論相當多，在五〇年代實證主義的衝擊下，即興起關於這一方面的討論。例如A. Cobban (1953) ; D. Easton (1951) ; P.Laslett (1956) ; I. Berlin (1962) ; L. Strauss (1957)。最近關於此議題的討論又逐漸興起，如美國相當重要的期刊《Political Theory》，在1995年曾經刊出以Jeffrey Issac: *The Strange Silence of Political Theory*為主的專輯，目的在討論為何自八九年共黨政權一一垮台之後，政治理論對其離奇冷漠的原因。在專輯中，許多政治哲學領域重量級人物如William Connolly, George Kateb, Seyla Benhabib等人，皆參與討論，立論相當尖銳，互不相讓。另外可參考Shapiro & Chapman (eds) *Theory and Practice*, 書中針對理論與實踐的辯論進行全面性的檢視。專輯收錄包括Warldron ; Nussbaum ; Brison等人文章，論辯相當精彩。此外另可參考Ball (1995) ; Barry (1990) ; Horton (1990) ; Miller and Seidentop (1983) ; Miller (1990) 等等。

況，並主張當前台灣地區有關政治哲學的研究必需跨越現有的研究範圍，多關注政治現實的問題，並理解理論所具有的實踐意涵，才能使政治理論的研究更有活力。

我們都知道，在西方，政治理論的發展相當富戲劇性。隨著一九六〇年代對政治理論憑弔的祭文²或哀悼文³的紛紛提出，西方政治理論研究與發展經歷了行為主義及邏輯實證主義的衝擊，而被迫賦予安樂死。然而西方政治理論研究卻在七〇年代以不同的型態死而復活。發展的趨勢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思想史詮釋：即所謂「新政治思想史」的出現，強調以歷史研究取代傳統對文本的詮釋。規範性政治理論的建構：試圖在對人性與人類基本需求之抽象基礎上，證成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原則。我們可以John Rawls的《正義論》出版，所引發的討論及批判可以看出這一趨勢的蓬勃發展。隨即也引發所謂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論辯。政治理論的實際應用：政治理論對實際現象的關照從對制度問題的關心，轉移到對公共政策的討論。例如社會福利、性別與族群差異、環境保護政策等等。本文將在第二節大略性的描述英美學界近幾十年發展的輪廓。

透過上述的介紹，我們理解到西方政治理論復興中一個重要的特色：公共政策的規範性反省，政治哲學和具體的政治現實做了密切的結合。然而究竟政治哲學與政治實踐應呈現何種關係，也一直在學院中爭論不休，許多人批評這樣的結合已經違背政治哲學工作的要旨。本文將在第三節中討論此議題，並提出西方政治哲學中幾個重要的研究成果作為實例，回應上述說法，並希望透過這樣的說明，進一步檢視台灣政治哲學研究的狀況。

長期以來，台灣政治哲學領域的發展，不論是研究主題或是研究人員的訓練等，受到英美學界的影響相當大，因此近幾年我們看到上述英美學術界的發展趨勢，也透過「引介」或「詮釋」的方式，反映在台灣的政治哲學研究

2. 例如Laslett (1956:vii) 即認為「在此時，無論如何，政治哲學已經死亡」。

3. 可進一步參考Wolin (1960: V) 。

上。然英美學術資源和台灣政治哲學領域學科自主性應保持何種關係？這個問題將在本文第四節加以討論。

此外本文也將檢討政治哲學領域在學科日益專工分化，所面臨的研究日益窄化的現象；以及經驗研究與規範研究截然二分的思維下，阻斷了和其他領域對話的機會，同時也限制了研究的可能貢獻。本文主張當前台灣地區有關政治理論的研究必需跨越現有的研究範圍，多關注政治現實的問題，並理解理論所具有的實踐意涵，才能使政治哲學的研究更有活力。最後本文將對台灣政治理論研究未來的發展提供幾項參考意見。

必須說明的是，政治理論的發展及問題的面向很廣，不可能僅就一篇文章即能窮盡，因此本文在寫作上有幾個限制：本文所指政治理論的範圍統括一般所謂的政治思想（political thought）與政治哲學（political philosophy）⁴，因此幾個概念交互使用，並未精細的區別政治理論內部的學科性質及範圍。由於在知識生產的來源上，台灣政治思想研究主要資源來自於英語世界國家，因此本文所談的政治理論的發展狀況只限於英語世界（Anglo-American）的國家，並未處理有關歐陸（continental）政治哲學的發展，所談到的歐洲大陸國家重要的政治理論作品也只限於在英語世界中產生重大影響力的作品。本文也無法全面性的處理英語世界政治理論的流派與發展，因此許多重要的思潮如馬克斯主義、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等將被排除在討論範圍之外。儘管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針對政治理論的過去及未來作學科反省與建議，然而無法在此處理及檢討有關「中西文化如何交流互通」及「社會科學如何中國化」等複雜而嚴肅的問題⁵，本文目的只在概略性地提出幾個發展趨勢，一方面用以反省及對照過去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也可說

4. 本文在此採用David Miller（1987）的區別：將政治理論分為「作為政治思想史的政治理論」、「作為形式模型建構的政治理論」、「作為理論式政治科學的政治理論」。因此政治哲學或政治思想史，都只是政治理論的一個分支。

5. 這一方面的議題可參考：楊國樞、文崇一（1982）；李亦園、楊國樞、文崇一等（1985）；賴澤涵（1987）；葉啓政（1991）；傅大為（1990）。

是作者在尋求自我認同的一項嘗試。

二、西方政治理論的復興

自從一九六〇年代，政治哲學正式被宣告壽終正寢，自七〇年代死而復活，短短二十年間發展相當迅速。回首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到一九七〇年代間，有人對政治理論的未來哀悼，有人則對政治理論的衰微額手稱慶，可說呈現幾家歡樂幾家愁的景象。

在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看來，政治哲學已經失去其作為一門知識及學科的合法性。因為所有的知識必須經過感官的觀察，同時「價值」判準也無法從感官的經驗事實中得知；社會科學唯有透過自然科學方法的引用，才能找到真理。另一方面，既然「概念」的意義及「理論」的建構直接來自於經驗的觀察，則以尋求永恆價值為職志的傳統政治哲學，不再具有成為一門知識或學科的合法性，其所表達的只是一些帶有偏見的價值嚙語⁶。

邏輯實證論表現在政治學科的現象則是行為主義的出現⁷。行為主義表現出幾種特色：政治科學應該區別「事實」與「價值」、以自然科學使用的方法作為政治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政治科學應是經驗性而非規範性學科，因此試圖透過經驗理論形式取代過去傳統規範性政治理論的架構，「國家」概念被「政治體系」所取代（Easton, 1953）；透過對經驗事實的分析及解釋所得的知識，取代傳統政治思想作為理解政治世界的資源（Held, 1991:12）。在這樣的學術思潮衝擊下，也難怪有人會對於政治哲學的未來敲響了喪鐘。

然而在六〇年代後期及七〇年代初期，隨著哲學領域中邏輯實證論的衰

6. 這一方面可參考Plant (1991:3-16) 對邏輯實證論的說明。

7. 儘管行為主義主張嚴格的區分哲學與科學，然而行為主義事實上是奠基在實證主義的哲學基礎上。見Ball (1995:41-44)。

微⁸，以及行爲主義在分析及解釋政治現象上面臨了許多研究上的盲點，也無法在政治價值的選擇上提供任何有效的判準，進而產生學科的認同危機。同時在政治現實上，所謂「意識型態終結」 (*the End of Ideology*) 的迷失，一步步被打破；「自由主義」並非如那些高唱意識型態終結的人所言那樣的完美無缺，它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型態，其普遍性受到相當程度的質疑。

另一方面，當時的美國社會面臨黑人民權運動、左派學生運動、反越戰⁹等政治事件的衝擊，造就了豐沃的思想土壤，可用來探究政治的基本價值，以及尋求成就這些價值的可能途徑。Bernard Williams即指出，七〇年代規範政治理論的復興，部份的原因即來自於解決政治現實危機的迫切感，也就是對於現存制度面對強大威脅時，油然而生的恐懼感 (Bernard Williams, 1980:57)。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政治理論終於擺脫過去的陰霾，顯示出復甦的跡象 (Horton, 1990:129 ; Miller, 1990:421 ; Held, 1991:11)。下列的區分無法全面性的掌握當代政治理論的發展，僅概略的描繪出以下幾個重要趨勢：

巨型理論的回歸

任何政治理論建構的原初動機，都有其政治環境的問題及背景。六〇年代中期在英語世界出現的幾個運動，對整個現代西方社會建立的哲學基礎提出懷疑，也因此替從事政治哲學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對政治現實作規範性反省的契機。然而自七〇年代以來，政治理論的回歸，都傾向較抽象的層次。他們都試圖找出某些普遍的真理或哲學基礎，作為政治組織的基本原則。在他們看來，政治哲學對政治事務所做的判斷，不同於分析哲學或邏輯實證主義者所言，只是主觀的價值偏好，這些判斷都具有理性的基礎；同時這些理性的判斷，可以引導實際政治走向正確的方向 (Strauss, 1957)。

8. 關於邏輯實證論興衰的討論可參見Held (1991:11-19) ; Plant (1990:17-21) 。

9. 美國是否出兵打越戰對許多人的影響力似乎相當大。見Ball (1995:49-50) 的自白, Horton (1990:129-130) 。

這似乎又回到傳統對政治理論的主張，只是較傳統政治理論更注重方法，特別是尋求某些客觀的理性基礎，來證成社會制度的基本原則（Miller, 1990:428; Shapiro, 1990:5）。我們可以Rawls於1971年出版之*A Theory of Justice*為例。Rawls的理論主要是處理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的問題，因而也涉及到政治義務、國家角色等問題，最重要的是他將「權利」議題重新帶回政治哲學的討論當中。他試圖透過契約論的方式，以及原初情境（original position）作為基點，建構一個取代功利主義的道德理論，以此來論證社會基本構成原則的合理性基礎，全文長達六百〇七頁¹⁰，條理分明，論證嚴謹，徹底反駁邏輯實證論的指控。透過他的「無知之幕」的設計下，所有的個人皆不知道自己的社會地位，也不知道自己的才能稟賦。因為在他看來，唯有將這些因素排除之後，才能尋求一個公平的條件，讓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居於平等的地位。在這樣的條件下，理性的個人會選擇他所謂的兩個正義原則。這種企圖在對人性與人類需要的抽象基礎上，描繪出一個自由與公道社會的理論型態，可以說又返回到傳統風格的巨型政治理論（Skinner, 1985）¹¹。隨後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Ackerman, *Social Justice in the Liberal State*；都可說是對其理論所提出的另一種理論嘗試。

然而這種試圖透過某些抽象的基設，來尋求政治社會制度合理性的理論途徑，隨即遭受到所謂社群主義的抨擊。在方法論的層次上，他們主張這種建基於原子論式個體及工具理性的假設，錯誤的理解個人的價值、目的及認同，以為個人可以獨立於其作為一個社群成員身份，來思索自己的目的及價值，未能清楚的認知到理解人類行為的唯一途徑，只有透過個人的社會、文化及歷史的脈絡才有可能。「社群」提供了個人與他人建立彼此共同關係的

10. Barry (1989:19) 即指出，姑且不論Rawls的理論在論證上的對錯與否，光是在那樣的學術氛圍中，從事長達六百多頁規範性的推理及論證，就已相當值得讚賞。

11. Skinner認為這種巨型理論的建構除了在政治哲學的領域看到之外，社會哲學領域同樣反應出這一趨勢。例如哈柏瑪斯的作品即為明顯的例子。見Skinner (1985) 中譯本可參考《歐洲思潮簡介》，第一卷，稻鄉出版社 p9。

環境與背景。社群主義同時也批判這種理論途徑強調原則的普遍性，忽視了文化特殊性對正義原則構成的作用。在規範層面上，社群主義進一步主張以「共善政治」來取代「權利政治」。這一論辯在學界喧嚷了許久，興起一股討論的風潮，至今方興未艾，也因而造就了許多論辯戰將以及許多精彩的作品¹²。九三年，John Rawls又出版了《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修正早年的許多論證，強調其正義理論的「政治性」，並在其兩個正義原則的基礎上，思考合理的多元主義（reasonable pluralism）對民主政治所產生的衝擊以及化解之道。毫不意外地，此書出版之後，隨即受到學界熱烈的討論及評論，也帶引出許多和政治現實相關的議題。

政治思想史的發展

「政治思想史」作為一門學科，是在七〇年代透過方法論上的論爭之後，才獲得其自主性的。一群不滿於過去對於政治思想典籍詮釋以及政治思想課程教授的學者，從研究的性質、目的及方法上，對傳統政治思想的研究提出挑戰。他們主張：1、在研究性質上，政治思想史是歷史研究而非哲學研究，以別於傳統對經典作品的研究。2、在研究目的上，政治思想史的目的在還原求真，重現文本的原貌，而非論善惡或求是非。3、在研究方法上，講求的是歷史（historical）解釋，而非哲學、文獻（textual）的分析。在這些學者看來，所謂「文本」的意義，不能僅從當代的解釋觀點來閱讀文本即可獲得。因為作者使用的語言、所使用的論證都有賴於文本產生時的知識環境。因此我們必須理解文本中所使用的觀念及論證的脈絡（context）。例如 Skinner 即認為要理解文本，不僅要瞭解它在字義上所表示的意義，更要理解

12. 被列為自由主義的學者及作品包括Rawls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Nozick (1974)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以及Dworkin (1977) *Taking Rights Seriously*。被列為社群主義的學者及作品則包括Sandel (1982) *Liberalism and Limits of Justice*.; MacIntyre (1984) *After Virtue*; Taylor, (1985) *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 Philosophical Papers II*; Walzer (1983)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等。

作者的意圖 (intention)。他認為思想家的意圖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研究典籍的首要之務即在重新發覺思想家的意圖。但是思想家的意圖並非單從文字的表面意義即能把握，而是經常潛藏在文字背後，並且常受到人、事、時地等各種因素的牽引而產生變化。他並且將意義分為「廣義」及「狹義」兩種：狹義的意義僅限於字面上所指涉的意義 (locutionary meaning)，廣義的意義則指非文字直接指涉的意義，而包括隱喻的或明示的語氣、提示等等。因此，詮釋典籍時必需瞭解思想家如何使用語言來表達他的意圖，以瞭解作者在歷史的脈絡中所欲解決的問題以及對問題的解答，如此才能掌握典籍的原意。因此一個詮釋者必須深刻地明白特定思想家的意圖、語言及該思想家對所處環境的理解，同時避免將自己的情境因素牽涉其中，才能做出忠實的詮釋。

透過在性質、目的及方法上的說明，政治思想史擺脫了過去政治哲學或政治哲學史的研究及論述方式，奠定了學科的自主性。近年來英美學術界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上的革命，實際成果相當豐碩，除了對經典作品提出新的詮釋，並從歷史系絡中重現原典的意義之外¹³，另一方面則有學者試圖從概念變遷史的角度，來理解不同政治環境下概念所呈現的意義¹⁴。例如對於 *Liberty* 的分類架構的批判與重建 (Skinner, 1984)；對 *State* (Skinner, 1989)、*Citizenship* (Walzer, 1989)、*Revolution* (Dunn, 1989)、*Patriotism* (Ditez, 1989) 以及 *Democracy* (Hanson, 1989 ; Dunn, 1992) 做概念史的詮釋。他們主張透過政治思想史典籍的詮釋，使我們得以在每一個不同的新時代裡，以新的歷史視野來反省當代與過去世代政治價值之間的變遷及轉折，並因此喚起我們「創造性地重建社會生活的知覺」 (Gunnell, 1979:161) ¹⁵。

13. 例如 Pocock (1985) 對 Harrington 以及 Machiavelli 的詮釋; Skinner (1978) 對 Machiavelli; Dunn (1969) 對 Locke 的重新詮釋。

14. 這樣的理論趨勢促使了概念史的研究，也就是研究政治思想中主要概念的概念史發展。舉例而言，Ball (1988) *Transforming Political Discourse*，以及 T. Ball、J. Farr、R.L. Hanson (eds) (1989)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都是這一類的作品。

15. Miller (1990:425-427) 認為概念史的研究有以下的好處：

一、使我們理解現階段政治論辯中流行的概念的歷史，並透過歷史解釋使我們知道當代概

這種政治思想史的革命，也具體展現在書籍的編纂以及課程的設計上。例如劍橋大學編纂的政治思想史讀本（*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系列叢書即是明顯的例子。在課程設計上，政治思想史方法論、政治概念史等課程的出現，也明確地反應此一學科的性質。

政治現實的規範性反省

第三個趨勢則是和社會議題有關的政治論述，亦即關照於實際政治現象的政治理論（Miller, 1990:434）。在某些理論家看來，經由對現實條件的理解與檢驗，政治原則才能顯現其真實的意義。因此許多理論家所從事的即在於如何將證成的政治原則，具體展現在實際政治制度、社會網絡的安排或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我們看到有的是將現有已經發展的理論實際應用在政策領域上，例如Beitz（1979）將Rawls的理論應用在國際關係的研究上，Daniel（1985, 1989）則將Rawls正義理論的思考架構，處理社會福利政策以及老人年金的問題，Wenz（1987）則進一步將正義理論應用在環境倫理學的探討上¹⁶；有的則是針對公共議題或是公共政策的規畫上提出哲學性的討論及反省。例如墮胎問題（abortion）、安樂死、人工生殖技術的倫理問題、色情刊物（pornography）、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綠色政治（Green Politics）、全民健保等議題的討論上，政治哲學家提出許多重要的見解，對於議題的釐清以及公共政策制定方向的規劃上，助益頗大。以至於會出現像《哲學與公共事務》（*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這樣標榜以哲學面向處理公共議題，並對公共政策作哲學性反省的刊物¹⁷。

念的使用不是唯一的意義，有助於我們用不同的概念架構來思考相同的研究主題。

二、有助於釐清當今使用的概念，過去在意義轉折上的種種面貌。

三、透過概念史的理解，使得我們更加清楚當今所處的社會及政治環境的特徵。

16 例如Beitz（1979）*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niel（1985）*Just Health Care*；Daniel（1989）*Am I My Parents Keeper?*；Wenz（1988）*Environmental Justice*。

17. 在發刊詞中，*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即明白表達出該刊物對於公共議題的哲學思維，可以在議題的釐清及可能的解決途徑上提出貢獻。也希望理論家可以針對實質的法律、社會及政治

另一方面則是針對現今許多新興議題進行哲學性的反思，例如女性主義¹⁸、環保政治¹⁹以及科技政治²⁰等議題、或所謂的另類陳述，如同性戀、少數民族議題等²¹。關於這些議題的討論，隨著這些議題具體展現在上述種種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的論述上，形成一股巨大的論述力量。

由上述可以得知，當代英美政治理論的發展呈現出多樣的面貌，重視思想「史」典籍的重新詮釋；透過對政治概念作歷史分析，更加理解政治概念與政治世界互為建構的關係；巨型規範性理論的建構；政治理論應用於實際公共政策歸劃等。正如 Berlin 在六〇年代學界對於政治理論的前途充斥著憂慮的氣氛中，所提出振聳發聵之聲：「只要還有理性的好奇心存在——一種基於動機和理性，而非僅僅根據因果或者功能性關聯、或者統計機率的合理化與解釋的企圖——，政治理論就不會完全在地球上消逝。」（Berlin, 1962:33）

三、政治哲學與政治實踐

從上一節的說明中，我們知道西方政治理論的復興呈現出一個重要的特色：從事對政治現實的規範分析。然而在政治學界，對於政治哲學與政治現實應保持何種關係，事實上看法相當分歧。有的主張政治哲學的目的在於改

問題，也可以針對實質問題所涉及到的較抽象層次的議題，作哲學式的討論。

18. 女性主義的理論發展相當蓬勃，包括自由主義、馬克斯主義、基進主義、精神分析社會主義、後現代主義、生態女性主義等等派別。關於女性主義思潮及流派的討論可見Tong(1989)。
19. 例如Goodin (1992) *Green Political Theory*; Wenz (1988) *Environmental Justice*; Eckersley(1992) *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等作品皆是。
20. 見Jonas (1984) *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1. 這些議題的性質在傳統的領域分類上無法將其歸類，因此對於這些議題的研究，不僅打破傳統的領域界限，甚至打破原有的學科界限，而獨立成爲一個研究的次領域。近年來國外許多大學都已超脫原有的學科界限，針對上述這些議題，成立跨領域的研究單位。

造世界²²，因此政治哲學是政治現實的指導原則。然而大部分的政治理論家對於政治哲學的目的則持不同的看法，不認為從事理論思考而得的原則，可以或應該做為人們選擇政策時的判斷依據。他們通常認為只要從事對「原則」以及其他理論家的原則的理解與解釋，他們的工作即算完成，至於理論的原則和政府政策之間的結合就交由公民自己來做決定（Thompson, 1984）。有的則根本否定政治哲學和政治實踐的關連性，認為政治哲學應該被視為一種解釋的活動而非實踐的活動。在Shapiro & Wagner（1995）所編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即蒐集了許多篇對此議題論辯的精彩文章，其中Jeremy Waldron即主張純（pure）理論的重要性。以下我們就以他的主張作為討論的焦點。Jeremy Waldron有兩個主要的論證：

政治哲學不應該和公共政策的制訂有太緊密的結合；

我們在理解或教授政治思想的經典時，不應該援引或指涉當代的政策辯論。

就第一點而言，他批評應用政治理論於實際政策的危險性。就第二點來說，根據他的看法，許多政治哲學的研究在詮釋過去的經典作品時，常常是以透過質問原作者對哪些原則、政策及實踐的喜好，而來理解這作品，例如有些女性主義者在理解柏拉圖時²³，認為柏拉圖可能會允許女人作守衛者，但他不會允許她在照顧一個家庭的同時，又擔任政治上的任務。而用這樣的角度來理解柏拉圖，事實上已經將當代政治脈絡中出現的政治議題，投射到對其作品的理解中，並試圖尋求解答（Waldron, 1995:141）。

另一方面，Waldron 認為這樣的詮釋方式事實上誤解了柏拉圖的作品，

22. 例如Strauss認為政治哲學的目的，即在於真實的瞭解政治事物的本質以及正當或善的政治秩序的本質。在Strauss看來，政治理論在尋求良善體制的知識，某個意義上即是哲學上尋求良善生活知識的一部份。政治哲學的判斷不只是一種主觀的價值偏好，他還具有一個客觀的理性基礎，而這些理性的判斷可以提供政治思考的方向。沒有了規範性的政治哲學，則政治生活即沒有方向。因此在Horton（1990:130）看來，Rawls, Nozick, Dworkin等人的理論被視為傳統政治哲學的復甦，主要的理論任務即在於尋求形而上的真理或哲學基礎作為組織政治的基本原則。

23. 例如Okin（1979）*Wome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錯誤的將他的作品視為一套規約式的藍圖。在他看來，柏拉圖的《理想國》只是一部啓發式教學的作品，目的在於使我們更清楚的理解什麼是正義，我們不應該錯誤地期待他的作品能真正實現，他只是站在哲學家的立場告訴我們某一種正義是好的，他既非官員也非立憲專家，因此他也就不是在寫政治行動綱要。

在他看來，政治哲學的目的即在於拓展與深化我們對政治場域的視野，以及對於在政治場域中種種政治判斷及政治決定的理解（Waldron, 1995:143）。而政治哲學中所謂的經典，其偉大之處即在於此，至於經典是否具有實踐的意義，不是評定此一文本是否偉大的指標。以諾錫克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來說，Waldron 為此書受到 Brian Barry 嚴厲的批判而叫屈，因為此書的價值在於它改變了我們思考及反省正義觀念的角度，而不在於他論證或否定了某種政策制訂的藍圖。我們不應把政治哲學作品視為政治的主張（political advocacy），或是一套社會政策的藍圖（Waldron, 1995:142）。

換言之，我們理解經典作品的目的，在於透過經典的理解與詮釋，深化我們對於政治及社會本質、以及我們用來思考政治社會的種種概念的不同視野。我們不應該將政治哲學家視為是立法家，也不應期待政治哲學對現實能發揮什麼作用。因此儘管在當代所謂政治哲學與公共事務連結的潮流相當興盛，但 Waldron 認為我們必須謹防這種對政治上重要議題解決的過度關注，卻進而取代了我們政治哲學主要的任務：對政治經典從事既艱難又枯燥的理解（understanding）工作（Waldron, 1995:170-171）。因此我們不能以當代的眼光去詮釋過去的經典，也不應認定這些作品可以是公共政策或是處方，他們並不指引我們應該去做什麼，他們只是政治哲學上的議題。令他遺憾地，在當代我們卻看到許多領域都在從事所謂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哲學家像是在醫院中的主治醫生，對於人的生與死提出種種的診斷處方；哲學家也像是在法學院中對於法律提供客觀理性的解釋及提出種種正義思考指標的先知；甚至像是政府官員一般，參與種種立法制訂的建議，從愛滋病防治、性別議題甚至參與在全民健保、家庭計畫的具體議程研擬中。在 Waldron 看來，這些

人似乎忘記了哲學的主要任務。因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既然未任官職，就不應從事政策的制訂。Waldron的主張相當程度的反應出學界中對於政治哲學的理解以及自己角色扮演的認知。然而這樣的說法不僅狹隘的思考政治哲學的性質，也忽視了任何深層的理解活動本身也是一種實踐的過程。

對於 Waldron 主張政治哲學的任務是在理解及解釋政治世界的看法，我們是同意的，然而我們實在不能理解為什麼這樣的目的，唯有遠離政治現實才能做到？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該如何評估我們所建構的理論的可行性？在作者看來，即使我們的理論工作是在深化我們對政治世界的理解，我們更應該涉入實際層面中，在更進一步理解他人觀點的同時，建構出一個更趨完整的理論。我們不僅需要檢驗理論在實踐意義的重要性，同時也必須理解理論對實踐的依賴性，不僅在於從理論來檢視及評估公共政策，同時更可以透過此來形塑及建構理論本身 (Bison, 1995:216)。正如 Thomas Nagel 所言，客觀性 (objectivity) 需要主觀的素材才能達致，而要尋求人類道德原則的建構，其素材則必須從人類的生活中來找尋。但為了不使政治理論成為烏托邦時，Nagel 對此提出一個相當清楚的說明。他認為我們理論工作的目的在於尋求一個政治體系的構成，其本身不但是可欲的 (desirable)，同時此一目標本身是我們可以理性去遵循的 (reasonably conform)。政治理論要免除烏托邦就必須同時尋求這兩種證成 (justification)。因此政治理論本身兼具有「理想」(ideal) 以及「說服」(persuasive) 的功能。它表達一個集體生活的理想，同時試圖展現給生活於集體中的每一個人，讓他們有意願生活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之中。一個理想若無法激發及說服人們生活在其中，則會淪為一個烏托邦。但任何的政治體系如果完全依循個人的動機，則無法具體展現任何的理想。然而正是由於政治理論中「理想」以及「說服」兩種功能彼此產生衝突，導致任何真正值得追求的理想無法被說服，而可以被說服的生活，卻可能是一個毫無希望可言的妥協，因此政治理論要免除烏托邦，就必須擺盪其中，找出平衡點 (Nagel, 1990:904)。

因此本文的要旨不在於鼓勵政治理論工作者投入所有的心力對日常生

活的議題做出立即的解決及反應，因為我們既不是立委諸公，也不是政府官員，尤其體認在當今的論述空間下，許多爭議性的議題上常常在尚未理性的討論及理解之前，即被要求表態靠邊站，使得議題的焦點更加的模糊，不易問題的釐清。然而本文主張政治哲學就像是謹慎從事的沒有時間限制的公民議論（conscientious civic discussion without a deadline），哲學家可以在沒有時間壓力及吵雜喧鬧的情形下，做較細緻及深層的討論。我們可以從某一個理論出發，去檢視在實踐層面上可能遇到的問題，進一步來反省理論建構的動機以及許多的價值預設；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從實際的議題出發，進一步來反省我們要解決這些問題時會碰觸到哪些哲學問題？即使我們的動機是要從事理論建構的工作，我們仍然可以從一個具有實踐意義的道德議題作為思考起點，傾聽他人的聲音，重視他人的觀點，如此將會有助於我們建構更為完整的理論。以下我們將以幾個實例來說明。

以Gutmann & Thompson的作品為例，從兩位作者長期關心的議題以及發表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在這方面的用心。在《倫理與政治》（*Ethic and Politics*）一書中，Gutmann & Thompson即開宗明義地指出倫理在政治場域的重要性，尤其在面對諸如核子武器、嚇阻、優惠性差別待遇（affirmative action）、墮胎、愛滋病防治等議題時，公共部門不能再迴避討論倫理議題。因為公共部門可以合法的使用武器來執行政策，而這些政策的後果會直接影響到我們以及後代子孫的利益。他們所做的利益分配，例如全民健保或就業機會等等議題的決定，攸關我們的生計。正因為官員與制度的作為深刻地影響我們的福祉，同時在民主政治之下，政府官員及部門是以人民的託付之名而行事，我們當然必須促使他們的種種政策及行為，必須符合我們共享的倫理規範（Gutmann & Thompson, 1990:xii）²⁴。

24. 所謂道德或倫理原則，指的是當某一行為會影響他人及社會的福祉時，所應尊重的權利及義務，以及當這些行為會影響個人及社會福祉時，集體的 policy 及實踐所應該滿足的基本條件。因此作者試圖從「政策制訂過程」以及「政策本身」的倫理特質兩個面向來考量倫理與政治的關係。

在 Gutmann & Thompson 看來，儘管公共政策不必然是政治場域中最重要的一部份，但是在當代的政治中確實扮演越趨重要的角色。因此知道如何以倫理的眼光來思考公共政策的目的及手段，不僅對於政府官員而言是重要的，對於在民主過程中的每一個參與者而言，都是一件相當重要且基本的事。因此他們從美國社會實際發生的案例以及最高法院的判例，例如合法使用暴力問題，以及官員背信問題等，來思考政治過程中涉及的倫理問題；另一方面則從分配正義、機會平等、個人自由等哲學上思維的課題出發，來檢視諸如墮胎、愛滋病防範、優惠性差別待遇等政策內容本身的適切性。在他們最近的著作中，他們更進一步從公共政策議題的討論中，反省當代主流的民主理論傳統：程序式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以及憲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在回應以及解決公共議題上的種種缺失，並在這個實踐意義的基礎上，進而建構所謂的審議式的民主理論（Deliberative Democracy）（Gutmann & Thompson, 1996）。

關於生活品質（The Quality of Life）的討論，近來也成為學術論辯以及政策制訂的話題。所謂生活品質，長期以來即是經濟、社會評估、公共政策、社會管制以及社區歸劃的主要指標。Nussbaum & Sen在九三年所合編的書《生活品質》中²⁵，即在於檢驗生活品質此一概念。他們的問題意識在於，當我們在研究一個國家或世界某一區域的繁榮情形以及當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時，我們該如何來判斷？哪些資訊是我們所必需的？什麼標準和人類的繁榮息息相關？

過去最常用的即是經濟成長的指標，例如國民基本所得（GNP），然而在許多看人看來，此乃是最粗暴的生活品質的指標。因為我們不僅需要知道

一方面理解在使用某一成就政治目標的方法時，所面臨的道德問題；另一方面則檢驗此一目標內容本身的道德問題。政治過程的道德問題在於檢驗政治的運作時，政府官員是否使用不好的手段來成就好的目的。假若我們無法避免政府官員以不好的手段成就好的目的的話，我們也必須尋求使用這些手段的道德限制（Gutmann & Thompson, 1990: xiii）。

25. 重要的理論家除了兩位著名的編者之外，包括G.A.Cohen, Michael Walzer, Charles Taylor, Hilary Putnam, Thomas Scanlon, Derek Parfit，都參與其中。

他們是否擁有財富，我們還要知道他們的生活方式（life style）。我們必需知道他們的生活期望值，也須知道他們的健康照顧以及醫療服務的品質、教育狀況（不僅是就學率，還包括教育的品質）、就業狀況以及勞資關係；我們也須知道公民在社會及個人關係網絡中擁有哪些自由、家庭關係以及家庭中的性別關係如何構成；同時理解是哪些結構阻礙或促成了人文活動的其他相關層面。因此實有必要系統性的探究生活品質概念的內涵，以及使其具體有用的方法。在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不論是經濟學家、政策制定者、社會科學家以及哲學家，共同面臨如何評估及測量生活品質的問題。

整體而言，這本書試圖從三個面向來理解生活品質的概念及適用性：檢討傳統研究途徑以效益（utility）為主要價值的適切性，並思考以能力（capability）取代效益的可行性；另一方面處理建構生活品質指標時，在方法論層次上所面臨的問題，比方說文化相對主義對於指標普遍性的挑戰；最後則從性別平等、醫療資源利用以及生活水平幾個實際面向來理解生活品質概念的可行性。

就概念層次的討論中，最被詬病以及受到許多的質疑的即是經濟學家所提出的GNP指標，而其理論的基礎，即在於成就個人利益（utility）或偏好（preference）最大化。然而效益（utility）能夠測量嗎？當我們在評估人的生活品質時，效益是一個正確的測量指標嗎？偏好的形成是否受制於外在環境而呈現扭曲與不公²⁶？許多哲學家從不同的角度論辯此一議題。他們嚴厲批判GNP指標的粗暴性，而認為我們應該重視財富以及收入分配的狀況，以及評估在此一國度中人們能夠從事活動的場域有多少（也就是他們在不同生活領域中能夠做以及能夠成為什麼），換言之，他們試圖以能力（capability）來取代效益。

另一方面，作者在尋求評估生活品質的適當標準時，也處理文化相對主

26. Amartya Sen (1993) 源自古希臘及羅馬傳統的信仰，認為偏好的形成可能因壓制以及不良的教育系統而受到扭曲及改變，這個情形若以傳統女人的處境來看即可明瞭。

義對於生活品質問題所產生的衝擊。換言之，當某一標準可以用來評估在世界不同角落中的不同人民的生活品質時，那個觀點是具有決定性的²⁷？究竟每個地區的生活品質的測量，必須以潛藏於該國傳統中地域性的指標來評估，還是指標本身具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意義？此外更從性別平等、醫療資源利用幾個角度來思考實際公共政策如何處理生活品質的問題。

對 Nussbaum 來說，有關於生活品質的研究，是她將對於古典政治傳統的理解及研究，呈現在當代生活的一種實踐活動。這些研究成果以及測量的指標，對於國際組織在收集資訊以及評估各國表現上，有重大的參考意義。她同時推崇 Amartya Sen 及其研究伙伴，在其參與的 1993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中，從哲學的基礎上挑戰了以往以「效益」作為生活品質指標的傳統研究途徑，也回應文化相對主義對指標的普遍性的質疑及挑戰。這些哲學家的工作不僅在於其提出有用的指標；他們也試圖在哲學的抽象層次上花費相當心力來證成他們的研究途徑的正當性，換言之，提供他們指標實踐的基礎，正是來自於他們在哲學上證成的理由（Nussbaum, 1995:205-206）。

再以世代之間正義為例。戰後世界人口激增，資源耗費殆盡，空氣、河川、土壤深受污染之害，引起人們的關注。人們理解到忽視環境後果的經濟成長對人類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不但威脅到社會的未來發展，甚至危及到後代子孫的生存，『世代之間正義』因之被提出來。簡言之，世代之間正義指涉這一代人在做決定時，是否對後代負有任何道德上的義務？另一方面，我們的子孫對我們能否有任何權利主張？具體來說這一觀念與環保議題與

27. 比方說，我們是應該去探究每個國家或區域的地方傳統裡是否有利於生活繁榮？或者是以一個所謂好的普世的人類生活標準，評估這些不同於這一標準的不同傳統？假定我們堅持傳統的重要性，則我們可以比較確定我們的基本原則：尊重差異。然而在很多傳統中包含許多不正義以及壓制性元素，而要反駁這些因素則不得不從一個較具批判性、普遍性的角度來思考。另一方面，若以一個普遍性的標準來思考人類的生活品質，儘管可以很清楚地理解到傳統造就某些人被壓制以及邊緣化的影響，然而卻面臨一個方法論上的問題：這一普遍的標準其基礎為何？這些基礎從何而來？人們又如何知道它是最好的？處理這一議題會面臨到忽視以及未能深入理解各區域文化生活的指控。

福利政策息息相關。比方說，由於我們不斷對自然環境進行掠奪式的開發，耗用許多不可再生資源，同時留下一個充滿高度污染的環境給後代，下一代人若想解決環境問題她們將花費巨大的財力與時間相對我們這個世代而言負擔更加沈重。因此享有一個良好健康的生活環境，在當代與未來世代之間並不是公平的分配。另一方面，當代福利國家對於福利政策提供財物基礎的方式是政府自稅收中提取經費以因應當年的福利支出，即所謂「隨收隨附制」（Pay As You Go）。然而此制度即是奠基在世代契約的基礎上，換言之，每一個世代之所以願意履行福利提供者的義務，即在於未來他們有權要求下一個世代提供相同的福利服務，並預期下一個世代的人也會承擔相同的義務。因此不論是福利政策或是環保議題都涉及世代的問題，不論涉及的世代是近期幾個世代或是更遙遠的世代。

關於此議題的探討，Peter Laslett可說是最早提出這個觀念的學者。他在七〇年代初一篇論文中即已提到。然而他也體認到此議題不論在概念或是理論建構上，都需進一步釐清²⁸。經過二十多年來鍥而不捨的持續討論，Peter Laslett在1992年與James Fishkin合編一本論文集Justice Between Age Groups and Generations，算是對此議題有了初步的成果。在合輯中他進一步提出一個比擬（metaphor）及兩個觀念，企圖對世代之間正義理論建構中所面臨的困境，尋求突破的可能性²⁹。他把不同年齡群以及世代關係比擬為一個慶典節目中稍嫌散漫的遊行隊伍，走在前面的人會影響到後面人的行為，但在隊伍後段的人卻不可能影響到前面人的行為。他又提出Intergenerational Tricontract與Intragenerational Intercohort Trust 兩個概念，希望藉此來釐清不同年齡群與世代間的關係。在他看來，世代之間權利與義務關係並非一個兩

28. 參見Peter Laslett (1979)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 以及Peter Laslett (1992), "Is There a Generational Contract?" , in Peter Laslett & James Fishkin (eds),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Fifth Series, Sixth Series.

29. 參見Peter Laslett (1992), "Is There a Generational Contract?" , in Peter Laslett & James Fishkin (eds),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Fifth Series, Sixth Series.

代契約所能解決，必須藉助於一個三代契約。換言之，權利的享有與義務的負擔都是單方向的，每一代人從他父母親的照顧中享有權利，而對他的子女負有義務。同時，同世代中不同年齡群的權利義務關係即類似於信託的關係，而國家或政府則扮演此一信託關係實現的角色。姑且不論他的努力是否成功，他的試探對政治哲學的研究無疑是推進了一步。因為長期以來，政治理論往往預設了一個沒有時間限制的世界，認為當世代的種種政治觀念原則以及政治制度，都可以適用於任何時刻，任何的世代。傳統政治理論對於正義、平等以及功利原則的討論，也都是在這樣的思維下所做的考量，因此把世代之間正義問題帶入政治哲學的討論中，可說是一個革命性的改變。

與上述的情況類似，從女性主義的研究中，我們同樣也可以看出政治哲學研究的新視野。作為一股新的政治思潮，女性主義不僅在理論上對傳統政治哲學產生巨大的衝擊，當「個人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口號喊出後，女性主義已經打破了過去原有對政治的界定及理解。它同時也是一股運動，具有相當的實踐力量。我們可以從英美世界，女性主義思潮以及婦女運動的蓬勃發展可以看的出來。政治論述和政治實踐緊密的扣合一起。Mickinnon即是一個例子。她在早年關心性騷擾問題，即以Sexual Harassment and Working Woman一書在法理學領域做出重大貢獻。她把性騷擾視為基於性意識（sexuality）的一種歧視，是父權社會結構性的產物，反應權力的不平等，同時這樣的不平等還受到現存法律的保障，並非個別的行爲。1980年間，她與Andrea Dworkin共同合作企圖透過《反歧視法》（antidiscrimination law），禁止色情刊物的出版，雖然成功地使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波里斯以及印第安那州印第安那波里斯兩個地方通過反色情法令，但最終仍遭最高法院認為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對言論自由的保障，而被判定為違憲。她的主張也隨即引發自由派，包括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陣營的批評，認為她們的主張不僅違憲，對於婦女運動長期的發展而言，也是不智與危險的訴求³⁰。1989

30 關於反歧視法的爭論可參考Catharine A. Mackinnon (1993), Only Words, Harvard University

年，Mackinnon發表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試圖建立一個女性主義的國家理論，對她或對女性主義的理論建構來說，都可說是一大突破。在書中，她對意識揚昇（conscious raising）有深入的討論，一方面將其作為一種運動上的實踐，同時也是一個方法論上的主張。同時，她進一步分析色情、強暴與墮胎，認為它們只是反應了男人的價值與權力的宰制，並被嵌入法律之中。因此，女性主義運動必須認清此一事實，並起而追求改變，創造一新的法理學，一個反應女性主義訴求的法律體系。雖然Mackinnon所關心的是自由主義所主導的美國社會，但是她的研究對於亞非社會來說，也應該有他山之石的作用。

最後我們再以Richard Falk來做說明。Falk研究國際法多年，著作等身。對追求一個正義與和平的世界秩序十分執著。早年他同情與支持越南對美國的戰爭與伊斯蘭回教革命，認為是亞非反抗西方霸權的正義之戰，必對人類幸福有所貢獻。但事與願違，越南與伊朗革命並沒有帶來民主政治與人權保障的繁榮景象，最後他也不得不承認做了錯誤的判斷³¹。雖是如此，他對規範性的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研究的努力，值得重視，對於突破了戰後幾十年來以政治現實主義為主導的局面功不可沒。他在 1980 年代一篇討論格老秀斯（Hugo Grotius）的文章中³²，對國際法的發展與一個正義的世界秩序的構想，有一段發人深省的話。他強調如果我們企圖追求一個較理想、較完美的世界，我們必須不存任何幻想，我們必須具有一種綜合想像與思維的創造力，必需深刻了解既有體系對變遷的抗拒力量，同時體會到改革的可能領域。他把這領域稱之為影子地帶（Shadowland），即尚未形成但卻即將出現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pp 22-31 ; Catharine A. Mackinnon & Andrea Dworkin (1988), Pornography and Civil Rights: A New Day for Women' s Equality ; Nadine Strossen (1994), Defending Pornography, Schibner Press.

31. 參見Falk Richard (1988), “Manifesting World Order: A Scholarly Manifesto,” in Joseph Kruzel & James. N Rosenau, Journeys Through World Politics, Lexington Books,.

32. 參見Richard Falk (1983), The End of World Worder: Essays on Normativ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的權力結構所投射回來的那一個空間，也就是改革最有成功可能的空間。他同時把二十世紀末比擬為格老秀斯的時代，是一個大變遷的時代，同時也是出現集大成的思想家的時代。

1995年Richard Falk出版On Human Governance報告書，暢論世界政治秩序的新趨勢。此報告是取材於多年來世界秩序研究計畫World Order Models Project的活動，基本論點在於體認人類歷史發展正走向一個轉捩點，傳統政治已不可能繼續維持下去，但今後何去何從卻有待大家的努力。換言之，傳統的地緣統治以被地域統治（*geogovernance*）所取代。所謂地域統治乃是指當代世界社會與經濟逐步整合的趨勢，在這狀況下，傳統主權國家已逐步式微。然而在當前人類既可能走向非人道的地域統治，也就是資本主義宰制的世界秩序；但也可能走向人道的地域統治，也即是走向一個民主的社會，一個既充分保障弱勢族群的基本權利，也同時顧及環保的社會。

從以上的例子可以得知，對於政治現實提出關心，並不意謂著對於政治現實給予立即有效的解答；對於那些非常專注於立即政治事務，並期待給於立即解答的哲學工作，確實會失去思考的深度及廣度；同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那是政策制訂者的事，並非政治哲學家的事。然而以上述來看，哲學家，經濟學家共聚一堂從事有關生活品質的研究，目的即在試圖提出論證以說服（*convince*）在世界不同角落的學者以及政策制訂者，採取不同的思考途徑。儘管他們很清楚自己並未站在任何具影響力的發言位置上，然而他們仍願意持續不斷地對此課題保持謹慎的關心。這正是政治哲學重要之處，因為它可以在不受時空壓力下，對於現實議題進行持續性的分析及理解，補給政策制訂過程中可能面臨的狹隘及缺失。即使政治哲學的目的是要拓展與深化我們對政治場域的視野，以及對於在政治場域中種種政治判斷及政治決定的理解，然而獲得對於政治場域較深較廣的視野本身即是一種實踐的過程，因此保持對於政治實踐的信念，可以驅使我們更加深化我們的哲學視野（*Nussbaum, 1995:207*）。本文希望透過上述的說明為基礎，進而對於台灣當前政治哲學研究作一概略的檢視。

四、台灣當前政治哲學的研究現況

作為政治哲學領域學術社群的一員大都瞭解，台灣政治哲學領域的發展，不論是研究主題或是研究人員的訓練等，受到英美學界的影響相當大，因此近幾年我們看到上述英美學術界的發展趨勢也反映在台灣的政治哲學研究上。假設上述對於英美政治理論發展的描述大致正確的話，則上述幾個趨勢反映在台灣當前的學術界情形為何？這些學術趨勢又是如何地在台灣學術界呈現的？

作者針對近五年政治哲學領域的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及研究計畫的數量及內容做粗略的分析³³，我們可以看出大部份的作品仍停留在對西方政治思想家作品的引介及詮釋。從整體的輪廓來看，近年來自由主義以及社群主義的論爭，討論的比較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舉辦過若干次大型研討會並出版專書。例如「正義及其相關問題」³⁴、「政治社群」³⁵、「多元主義」³⁶。而所謂「新政治思想史」在英美世界所發揮的影響力，雖未在

-
33. 本文的資料來源是根據八十年至八十五年間，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中，有關政治思想的作品，以及國科會獎助計畫及作品作粗略的內容分析。在期刊論文部份，我們針對166篇政治理論的相關著作，作粗略的內容分析發現，大部份的作品以引介西方政治思潮或詮釋某思想家作品為主，關於政治現實或公共政策作規範性分析的作品則相當少見。在國科會獎助計畫部份，近年來許多整合型計畫構想的提出，則有逐漸改變方向的趨勢。例如中研院社科所由郭秋永教授所主持之大型整合型計畫『民主政治專題研究』的主要意圖，即在對於民主政治下相關重要議題或概念，進行思想史的分析。黃默教授所主持『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有關正義社會的省思』的計畫則試圖從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論爭、女性主義的政治論述與實踐、世代之間正義理論等議題，從理論的理解，進一步檢驗台灣政治現實所面臨的問題，如國家認同、民族主義、性別平等、環保運動以及福利政策的議題，並意圖提出規範性的反省，都可以看出這樣的一個趨勢。
34. 在此次會議中幾篇專文即針對Rawls的正義理論的詮釋及批判。例如 戴華(1991)；張福建(1991)；施俊吉(1991)等。
35. 這次的會議中除了引介Rawls晚期理論上的轉變之外，則出現一些針對社群主義政治理論家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及提出的解決途徑的詮釋作品。例如戴華(1995)；林火旺(1995)；蕭高彥(1995)；錢永祥(1995)等。
36. 在此次研討會中，對於當前西方對於多元主義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的討論，學者們從不同的理論流派，作相當精闢的分析。例如 蕭高彥(1996)；林火旺(1996)；蔡英文(1996)；張福建(1996)；江宜樺(1996)；黃瑞祺(1996)等等

台灣學術界引起廣泛的討論,但是關於政治思想史方法論的討論也被介紹到台灣來³⁷,許多學者也透過「新政治思想史」在方法論上的啓示,重新詮釋重要思想家的經典作品³⁸,以及對於政治上重要概念如民主、代表、多數決的重新詮釋³⁹,成果相當豐碩。但是關於女性主義、科技、環保議題討論則相當貧乏⁴⁰。然而隨著這些議題近年來不斷的出現在臺灣的社會場域中,在可預見的未來,關於這些議題的討論將逐漸的受到重視。至於規範性的反省公共政策的作品也是屈指可數⁴¹,中研院社科所舉辦的「公共與哲學規範」研討會基本上算是這一方面的初探⁴²。然整體而言,「引介」及「詮釋」多於理論的建構以及對公共政策的反省。

五、台灣政治哲學研究的困境

-
37. 參見陳思賢(1989);陳瑞崇(1993)。至於方法論的論爭所指涉到的詮釋學,近年來則在哲學界及社會學界中廣為流傳。
38. 如陳思賢(1994:1995)的柏克;陳思賢(1991)、蔡英文(1996)的歐克夏;陳瑞崇(1995)對霍布斯。
39. 中研院社科所在去年已向國科會申請有關民主研究的三年期的大型整合型計畫,試圖從思想史的觀點,釐清人權(human rights)、代表(representation)、參與(participation)、多數決(majority)、自由(liberty)、平等(equality)等重要概念和民主政治的關係。
40. 關於女性主義的引介過去大都在文學界、社會學界中較為豐富,政治學界的文獻出現較少。根據國科會八十五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專刊的文獻指出,目前正在執行中的研究計畫則有周碧娥:《性別、婦女運動與民主化:1985年以來台灣的婦女與政治》;林方玫,《女性主義、認同政治與參與式民主》。至於環保與政治、科技與政治的議題則尚未有系統的作品出現。將政治哲學上的論證來討論環境倫理學的作品可參考戴華(1993):「永續發展的規範意義」,載於《台灣經濟預測與發展》第24卷第1期pp:63-87。黃默《世代之間的正義》,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1996。
41. 最近欣聞學者嘗試將西方關於政治哲學中關於公民教育的討論進一步落實在教材的編寫上。例如瞿海源教授所主持的研究計畫中,除了進行對於西方重要文獻的譯介之外,更進一步從事國中「公民與道德」教科書的編纂工作。此外林火旺教授近幾年的作品中,除了思考以John Rawls為主的自由主義論述之外,也嘗試透過對西方關於公民身份(citizenship)以及公民道德(civic virtue)的理解與討論,進一步思考當前台灣公民教育的改進方向,都可以說是政治理論與公共政策結合的實例,然而總體而言,仍是少數。
42. 在這次研討會中,儘管也討論到如墮胎、環境倫理學以及公共領域等問題,然而仍停留在引介西方對此議題的討論,未具體觸及臺灣的現實問題。

透過上述對英美政治理論的發展趨勢，以及台灣政治哲學領域和英美政治理論的密切關係。不禁使我們立即面臨這樣的問題：「引介這些英美政治思想作品的目的為何？」「這些英美學術界的政治思想和台灣政治現實有什麼關係？」在台灣的時空環境中，對第一個問題的解答，在**某種程度**也解答了第二個問題，也就是透過西方理論資源的理解，作為面對台灣具體情境問題時的理論資源，並試圖尋求未來平等對話的可能。本文將從對此問題的反省，逐一檢討政治哲學領域本身學科以及和其他領域及學科間出現的一些問題。

政治理論研究遠離政治現實

由上述可知，台灣政治哲學領域的發展，在理論的討論和議題的選擇上和西方的關係密切。不論是「新政治思想史」對於原典的重新詮釋，將所謂的「經典」作品放置在歷史的脈絡中重新還其原意；或是政治哲學直接針對公共政策作哲學性的反省，皆是西方政治哲學蓬勃發展的主要原因。然而這幾個不同趨勢，不論是以新的方法工具重新詮釋經典、建構巨型理論或對公共政策的哲學性反省，在台灣大都是以「引介」的方式呈現。我們看到許多的作品針對某位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作整全性（**comprehensive**）介紹，或是針對思想家某一概念的詮釋及批判。這一方面我們看到許多精彩的作品，使讀者能一窺理論家浩瀚艱深理論的全貌，也看到許多學者費盡苦心地為思想家解答了許多疑難雜症。然而這種「哲學式的政治理論」不再探索具體的政治情境，以後設理論（**metatheory**）與範疇取代了人與其具體的政治情境，成為政治思索的主要對象時，使得政治理論和政治現實漸行漸遠。以他人的政治理論為思索的主要對象，而忽略了直接面對政治的必要性，造成學院政治理論越來越傾向於在空洞化，在脫離歷史脈絡的格局裡進行政治批判，「政治性」已被馴服，成為「沒有政治的政治哲學」⁴³（**Mouffe, 1993:41**），同時

43. 在許多學者看來，不論是《正義論》或《政治自由主義》都好似對於現實世界的紛紛擾擾視而不見。見張福建（1996:19）的批評。

也失去了實踐的相關性（Shapiro, 1990:5-7 ; Dunn, 1986:182）。

事實上，要探究政治理論遠離政治現實的理由其實相當多，在許多學者看來，學科分工及專業化或許也是主要的因素。當代的政治理論已經成爲一個專業化的學術次領域，他們學術實踐活動已被規則化、常態化。在學院中，我們往往針對被認可的主題，遵循學術的規範，替自己和他人在理解文本時的迷惑作解答。這個情況對於促進學術社群、制度的發展，以及促進專業化知識的成長有一定的貢獻，然而卻可能遭遇到知識一致性（conformity）的危險，以及抑制更多與常民生活相關議題的研究（Issac, 1995:643）。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政治理論家只願意和同行對話，其讀者群相當程度地局限於學院中從事相關研究議題及興趣的學者，影響力也只在學院中流傳；面對的是專業化的聽眾而非一般的讀者群。比較喜歡專業的語言甚過素樸的表達，喜歡深奧有系統的陳述甚過於常識性的理解；政治理論家也傾向於從事期刊論文的寫作，而不喜歡通俗性的文章，很多作品透過專業的學術審查及種種規範之下，出現在學術社群中（Ricci, 1984:9-10）。作品不僅無法在社會中廣爲流傳，進而影響一般大眾；即使同是從事政治學科教學的其他領域的研究者，也未必能夠閱讀得到。在這樣的情況下造成的結果是學院裡彼此流傳著彼此的作品，學院的知識生產者同樣也是知識的消費者（Simons, 1995:688）。或許正是這樣的表達的方式，是造成當今政治理論對於政治現實，表現出離奇沈默的部份原因（Issac, 1995:647）。然而政治理論唯有在學院之外產生共鳴，才有意義。所謂重要的經典作品，馬基維利的《君王論》、霍布斯《利維坦》、洛克《政府論次講》等，不僅富有相當高的文學及藝術價值⁴⁴，往往也涉及當時代的政治爭議。因此當代學科分工造成了學院政治理論家生活於象牙塔之中，遠離了真實的世界（Miller & Siedentop, 1983: 4; Ricci, 1984: ix-x）。政治理論家不僅遠離了公眾議題，他們也失去了與社會大眾的連結

44. 誰也無法否定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是部偉大的哲學作品，同時也是偉大的文學藝術作品，然而卡維爾諾的《看不見的城市》是不是呢？關於政治哲學是否應該用專業的語言及論述方式來呈現，抑或以文學的手法達致追求真理的目的，可參見Ronald Beiner（1992: 10），*What's Matter With Liber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的討論。

及互動。Gunnell (1987:10-42) 稱此種現象是政治理論的異化 (the alieation of political theory)，而這種現象同樣反映在當前台灣政治哲學領域的研究作品中。

然而正如上述所言，我們並非主張抽象的理論思維是錯的，事實上任何研究都無法避免地需要這些工作，政治理論的建構，缺少這些同樣也是無法想像的。政治理論家也不是要變成政治上積極參與者或是政論家或是經驗科學家。但是，我們必須理解到一點：我們從事研究以及調查的世界是和這些人所思考的是同一個對象，而非那些脫離現實不切實際的真實。因此政治理論研究作為一種志業 (vocation)，除了重視自己的知識興趣之外，是否應該清楚的體認到詮釋及引介西方的政治理論，和台灣具體的政治現實產生什麼有意義的關連？既然在知識生產的來源上，我們和西方的發展潮流緊密相扣是不可避免的狀況，則我們的重要任務即在於，如何吸取西方學術資源並與西方學術界建立平等的對話。我們必須思考當西方的學術資源或理論上的建構，進入台灣的政治論述場域之後，產生了什麼影響？換言之，當我們面對台灣當前的處境時，這些西方的學術資產，除了能夠讓我們重新去正視這些過去未曾重視，而如今被發掘的議題之外，它能夠給予我們什麼理論途徑上的資源？作者在此不是否定政治哲學領域工作者對於西方重要政治思想作品的詮釋及引介，而是認為除了在詮釋個別思想家的理論之外，我們是否應該理解這樣的思想資源可以給予當前的政治環境產生什麼樣有意義的連結。以上述所謂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論爭為例，爭論的焦點大致可以區分為「自我的構成」(Constitution of the Self)、「社群的性質」(the Nature of Community)、「普遍主義與相對主義」(Universalism v. s Relativism)、「國家中立性原則」(Neutrality)、「文化歸屬與國家認同」(Cultural Attribute and National Identity) 等。上述有些議題的討論對我們似無切膚之痛，有些則具有相當的啓示，例如「文化歸屬」及「國家認同」的問題，對於當前台灣社會處在「國家認同」分歧嚴重的處境而言，是相當有意義的論述。政治理論研究者有責任也有必要針對這個問題提供理論上的分析以及實際上可

行的建議。這時候我們除了理解西方政治哲學在概念層次上如何思考「族群認同」、「民族認同」以及「國家認同」的糾結關係，以及在實際層面上對於這問題的反省之外，我們更必須去理解認同問題在台灣如何呈現，最後更應指出這個本土經驗，如何可能對國際學術界產生刺激與補充的作用⁴⁵。

再以民主理論的研究為例，透過嚴謹的學理探討，釐清民主政治的概念意涵，並且對其相關的基本假定、核心觀念及重要議題做出分析、批判及評估，對於當前處於民主轉型的台灣社會當然有其重要性；然而除此之外，我們是否應該進一步扣緊台灣當前民主化過程所發生的種種問題，做規範性的評估與反省。

這不必然是一種實用論的看法，也不必然預設從事政治哲學研究的目的在於對當前的政治問題提供立即有效的解決途徑；而在於西方學術界的理論在於解決它們處境下所產生的問題⁴⁶，因此我們同樣必需思考我們自己的處境，進一步理解這樣的理論途徑能夠給與我們什麼樣的資源，不必完全拒斥但也不是全盤接受，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深刻的體認出我們自己的問題，甚而發展出自己的理論，和西方進行學術對話也才有可能。

今年甫復刊的（當代）⁴⁷雜誌在發刊詞有一段話發人深省：

（當代）雖然不敢指望專以「文化菁英」為讀者對象，但我們確有溝通學術界及文化界的意願。知識份子的重要職責就是要為學術和文化兩界搭橋，如果尖端學術不能在文化界引起共鳴，而一般流行的庸俗趣味反倒成為當前人文的主流，那就是知識份子的失職。

（《當代》，1986）

巷

45. 請參考江宜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族群身份，文化歸屬與政治認同：論當代西方社群主義思潮對臺灣社會認同問題的啓示」計劃書，作者提出相當清楚的說明。

46. 例如社群主義的興起某種程度也在對西方個人主義產生的弊端的一種反省。見Bellah, Robert, et al (1985),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Harper & Row.

47. 《當代》可以說近十年來引介西方思潮著力最甚的刊物，然而隨著《中國論壇》、《當代》以及《島嶼邊緣》等雜誌的相繼停刊，一方面使我們體認到試圖在學術及文化兩屆搭立橋樑的艱難性，另一方面更使我們深切的體認到兩者的落差如此之大，更遑論學界與一般大眾的距離了。

經驗研究與規範研究的截然二分

儘管行為主義革命未能造成典範性的革命，然其強調以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來研究政治行為，以致建構科學理論，仍是政治科學研究的重心。許多研究也指出，經由行為主義的衝擊以及政治分析的專業化，造成政治研究領域形成歷史的、規範的、經驗的三雄頂立的局面（Gunnell, 1987; Held, 1991:11-21）。「政治理論」和「政治科學」的分家，雖未顯示出政治科學的知識優於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然彼此各搞各的，對其他領域的研究置若罔聞，確是學院裡常見的現象。我們常常聽到許多經驗研究者認為自己嚴守研究分際，不處理規範性問題，其理論任務在於「描述」及「解釋」政治現象；有的則以「科學的」眼光看待政治理論，認為透過冥想得來的知識，虛虛玄玄，經不起科學方法的檢驗；從事規範性理論研究者則對於政治現狀所做的經驗性研究能否掌握人類生活世界的真相產生存疑，因此也抱持著冷漠的態度，長期以來學界似乎謹守著經驗性研究與規範性研究的劃分。事實上，任何認知活動都必然涉及解釋（interpretation），而任何一種解釋必然蘊含某一種特定的概念、信仰及標準。任何一種我們從事對政治現象的解釋架構，必然決定了我們對現象的看法。它不僅決定了我們的理解，也決定了我們對政治行動過程及結果的評估。所以不僅在研究上嚴守價值中立是不可能；不迴避價值問題，正視衝突價值的選擇，更是政治研究者必需面臨的課題。因此成功的政治理論必然包括對概念及原則作哲學性的分析，以及對政治結構及政治過程作經驗性的理解⁴⁸，任何一方皆不可偏廢。唯有透過經驗研究持續地探索現實的種種現象，才能使政治理論有效地提供理解、詮釋及改善不斷在蛻變中的人類的政治存在的參考圖像（許國賢，1993：22）⁴⁹。

48. 政治理論可以包括幾個層次：一、哲學層次：關注概念及規範的問題；二、經驗分析層次：關心理解及解釋的問題；三、關心評價的問題；四、歷史層次：檢驗政治論述的變遷過程，以古鑑今（Held, 1991:18）。

49. 以作者今年的研究為例，在今年的國科會研究計畫中，試圖透過焦點團體（focus group）的研究方法，對於台灣社會幾個涉及重大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議題的當事人進行訪談，以瞭解他們對於代間正義（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議題的看法。這其中包括核四興建

儘管政治哲學和經驗研究存在著方法上的分歧，但是彼此之間不應是一種完全敵對或不相容的關係，而是可以彼此對話，呈現一種相互依存、互助共容的研究面貌⁵⁰。

以民主理論為例，當代民主政治的基礎以及立憲主義的基本原則，都是經過歷史的過程，而構成當代政治社會的重要建制。然而隨著社會的演變，這些規範性基礎是否經得起考驗是值得我們反思的。在西方對於性別、族群、少數團體等議題的研究，不斷地挑戰傳統對於「什麼是政治的」的理解，其不僅突顯出傳統政治理論對差異性（*difference*）的忽視，也進一步思考如何將差異予以制度化⁵¹。另一方面學界也在思考如何因應來自科技不斷進步對現有民主制度產生的衝擊⁵²，以及對於層出不窮的環境議題在制度上尋求解決之道⁵³。以台灣的現狀而言，當前正逐步邁向民主化的道路，然而期間所產生的種種政治亂象（如黑金政治）、對民主觀念的混淆（如民粹主義⁵⁴）以及制度的爭論（如憲政體系的建立），均顯示對民主政治做系統性評估的

所涉及環境正義以及蘭嶼核廢料儲存所涉及的族群正義問題，也包括鹿港反杜邦事件中所涉及的跨國資本以及公害輸出的議題；以及濱南工業區開發案中關於野鳥保護等深度生態觀點與經濟發展理念的衝突；以及當前台灣政經結構中石化資本所具有的支配力，另一方面也希望透過此研究體認當前台灣環保運動所面臨的來自國家機器以及資本家重重的挑戰。在研究過程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管是來自不同學術領域的專家學者、具有政策壟斷力的官員或資本家、或是來自不同社會底層的人民，都有一套相當清楚何謂「正義」的看法。彼此各說各話，立場堅定。然而令人無奈的是，在現有的政經結構下，何謂正義的原則以及政策，事實上也顯而易見的。從事政治哲學的研究者該如何思考這樣的現象，是一個需要嚴肅思考的課題，尤其在當前學院中正籠罩在對西方政治理論關於「正義」及其相關議題熱絡的研究氛圍中。儘管目前研究仍在進行中，成效也尚難評估，然而至少使我們較清楚的掌握西方理論資源以及當前政治現實之間的差異點，有助於我們在源引理論甚至在建構理論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參考。

50. 可以參考Conover 等人（1991），針對政治哲學界興起的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論爭中有關公民資格（*citizenship*）的討論，希望透過經驗研究，比較英美兩國公民的實際態度，是一個有趣的例子。

51. 這一方面可以參考Benhabib (ed) (1996); Young, (1990); Phillips (1995)。

52. 可參考Iain McLean, (1989) 的論證。

53. 可參考Lafferty & Meadowcroft (eds) (1996) 一書中關於民主政治與環境主義間的討論。

54. 參考黃光國（1995）；錢永祥、王振寰（1995）。

迫切性。儘管政治學界對於民主化過程以及其制度層面的各種問題，已經建立了相當完備的經驗性研究。然而迄今為止，除了部份的同仁開始從事民主政治重要概念的思想史研究之外⁵⁵，尚未見到對於民主政治做規範性的評估研究，也顯少見到針對台灣自戰後民主發展的進程中，有關「民主論述」做歷史性的研究⁵⁶。「民主」作為一套西方價值體系及思維方式如何在台灣生根？它又是以什麼論述方式呈現？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中，它又如何成為人們共同肯認及追求的價值？搜尋台灣民主的未來道路，除了正視現在，期許未來，更要回首過去。

除了做「論述史」的研究之外，對「民主」的研究更需關照政治制度以外的許多面向。「民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不僅在政治制度上呈現，也具體展現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如性別與族群差異關係、家庭、工作場所、學校、社會組織、科技及大眾媒體等等；如果不全面性的關照這些面向而宣稱台灣已邁向民主社會，是無法掌握台灣民主的未來。對於這些面向的研究都必須同時兼具經驗事實的觀察以及規範性的評估與反省。

綜上所述，如果能夠整合不同專業領域的同仁，針對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呈現出的種種政治現象作經驗性的觀察及分析，並進一步提出規範性的反省，是一個必須關注的研究方向，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呈現台灣民主的全貌，也才能真正發揮理論的影響力⁵⁷。

55. 從今年提出國科會申請的計畫來看，除了上述中研院社科所關於民主理論相關概念作思想史研究的整合型計畫持續進行之外，據聞呂亞力教授所主持的大型整合型計畫申請，試圖從理論、經驗以及歷史的角度，探究台灣的民主歷程，可以說是朝此方向的初步嘗試，也確實彌補過去這一方面研究的不足。

56. 學界關於台灣政治論述史的討論，可參考傅大為（1988）；錢永祥（1988）；陳瑞崇（1993, 1994a, 1994b）薛化元（1996）。

57. 作者更深切的期望在台灣能出現如美國學界出版的《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此類性質的刊物，針對民主政治的各個層面（不論國內或國外）提出經驗解釋與規範反省，進一步深化民主的價值。

政治研究與其他領域的疏離

社會科學的專業分工，是近代知識進步的一種表徵，許多領域日益專業化，寫作的產品規範化、形式化，自成一套學術系統。然各領域從不同的面相及角度來分析政治現象，無法呈現整個政治社會的圖像，因此常常有見樹不見林的情形。「專業化」使各專業領域產生對政治生活特定部份的理解及研究，其所呈現的是片面及單向的。然而專業化並不必然導致知識的片斷化。如果各領域可以共聚一堂，針對某一議題從其研究角度及面向共同探討，相信必能產生更大的理論貢獻。

以上述《生活品質》一書為例，可以說是經濟學與哲學兩個學科領域合作的嘗試，其目的在鼓勵進一步跨學科的研究，且能夠使研究成果成為政策制定的參考。這樣的嘗試不僅造成許多經濟學者在面對他們研究出發點的哲學問題時較具敏感性，使他們在從事任何指標的建構時不得不處理基本的哲學問題。另一方面，哲學家也逐漸理解到連結基本的理論研究工作和對實際複雜問題理解之間的重要性（Nussbaum & Sen, 1993:vi）。

若以此來看，「政治認同」（Political identity）的爭議可能是台灣社會未來五年至十年之間，主要面臨的議題之一。因此隨著台灣認同衝突問題的日益嚴重，在文學界、社會學界、文化研究者、以及政治學界，都有許多的學者同時在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然而因彼此缺乏溝通與互動，以至於各自單打獨鬥，未能集中火力，產生更大的力量。因此若能結合不同領域及學科的研究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從事「政治認同」的研究，相信必能發揮整合性研究的功能，使研究成果更具深度及廣度。對於公共政策的反省也是如此。舉最近爭論不休的醫藥分業問題來看，整個爭議從都到尾都呈現出好似只是醫界與藥界之間利益衝突的問題，而無關於消費者的權利保障以及政策在制訂過程以及政策本身正當性的許多問題。然而這是攸關全民健康照顧體系以及國家醫療資源分配的重大議題，不可輕忽之。在學界中，不論是政治哲學、社會學、社會工作以及福利經濟學的學者，對於社會福利議題的研究成果頗為豐碩。倘能進一步對類似此議題進行跨學科的研究並持續表示關

心，必能對現有混亂的決策過程以及政策內容提出建言。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處於台灣當前的環境，政治理論的研究除了不斷尋求經驗與規範、理論與實際的對話之外，我們同時必須深切地體認到台灣與西方對話的必要性。儘管政治思想領域的走向與發展和西方學界的關係相當密切，未來仍將會繼續維持這樣的關係，改變的可能性不大；但我們也應該力求逐步追求平等的對話，獨立建立自己學術思想上的基礎。

六、對未來發展的幾點建議

以上我們已大致的描繪出台灣政治思想領域的研究方向以及面臨的困境，面對未來的走向我們有以下幾點具體建議：

著重公共政策的規範性反省

從上述對西方政治哲學的發展趨勢的說明可知，自六〇年代被宣告壽終正寢，演變到今天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景象，政治哲學和公共議題形成有意義的聯結是一個重要的特色。然而這同時也是目前台灣政治哲學界較少嘗試的面向。

以性別議題為例，過去在台灣，從事女性主義政治論述的研究寥寥可數。近年來女性主義逐漸被引介到台灣來，但都僅限於文學界、社會學界；政治學界在這一方面投入的人力相當的少。然而女性主義論述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在西方我們看到女性主義論述的實踐力量相當驚人，婦女運動的蓬勃發展，不僅打破原有政治的疆界，在尋求新的政治生活上，也提出了許多的可能性。面臨台灣女性意識的覺醒，許多衝撞父權體制的運動策略不斷展現在公共場域之中，然而許多議題的開發及討論，仍需要更多人的參與，因此應當鼓勵從事女性主義的理論研究，並進一步尋求在制度以及政策上落實性別平等的可能性。我們同樣也期待更多人力投注於對於少數族群以及弱勢團體的研究，不斷關注在「正義」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尋求一個符合社會正義

的藍圖。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在政府「經濟掛帥」旗幟的號召以及「科技萬能」、「征服自然」的觀念支配下，不斷地追求經濟成長，卻對自然環境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如今我們已經面臨到環境品質無法忍受的地步。如果每一代人承認其後代子孫享有某些權利及機會去享有世界的資源，則每個人在做決定的時候必須承擔道德上的義務，不損害到後代子孫的生存及福祉⁵⁸。因此在面臨當前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尤其當今關於「國家競爭力」的討論不斷，然卻仍沈溺在經濟成長的迷失之中，忽視綠色思潮對於傳統競爭力迷失的衝擊之時，如何思考當前台灣社會的進步及發展，又不以犧牲後代福祉為代價，從一般性原則的論證⁵⁹及公共政策各面向作哲學性的反省，可能是將來我們必須走的方向。

台灣政治論述的重建：

正如上述所說的，從「論述」的角度去理解台灣的政治發展，是當前缺乏的思考面向。隨著台灣戒嚴時期的結束，逐步朝向民主化的目標在前進，政治論述呈現出開放與多元的景象。然而回首過去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中經歷許多的階段，不同階段的政治論述卻未曾被細密的整理⁶⁰。在當今西方學界已發展出政治思想史方法論的有利條件下，我們是否可以透過他們所提供在方法上的資源，實際理解台灣政治發展的過程，從概念變遷與政治發展兩者互為建構的關係出發，重新詮釋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政治論述；亦即經

58. 從世代正義的角度來論證每個世代的每個人具有同等機會去享有世界的資源，不論他是屬於過去現在或未來的世代。

59. 參考黃默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世代之間正義問題》成果報告書, 1996。

60. 以《自由中國》半月刊時期的政治論述為例，在那個時空中，他們已經激烈的討論過如民主、自由、憲法、議會、政黨政治、地方自治甚至省籍問題。《自由中國》可說是促進台灣政治意識的產生，以及凝聚過程中一個相當關鍵的力量，他們所建構的政治論述和當前的政治論述具有相當的關聯性，但卻因為政治因素而形成論述的中斷，這是相當遺憾的事。近年來我們已經看到許多關於《自由中國》的研究，然到解嚴之前的政治時空下的政治論述則尚未見到有系統的研究。

由西方對語言與政治生活關係深刻地反省，並在這樣的思維及方法的操作下，重建戰後台灣政治論述史，使政治思想史研究具體展現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中。

七、結 論

本文寫作的主要目的，在於對本學科的發展做初步的反省與建議。透過上述的說明，本文粗略地描述了西方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政治理論的發展趨向，也同時指出，儘管長期以來台灣政治哲學的發展和英美政治學界的關係相當密切，然而上述西方政治哲學的發展趨勢，並未顯著地反應到台灣政治思想領域的研究作品中，學者仍著力在對西方思潮的引介上。另一方面，隨著學術專業化分工日益細密，政治哲學研究也出現研究範圍日益窄化，研究取向脫離政治現實，以及各次領域之間彼此無法對話的現象。因此本文主張政治哲學研究者應該擴展當前的研究範圍，除了對思想家作品的詮釋外，應該多方面從事對政治現實以及公共政策的哲學性反省；同時也可針對某一議題嘗試和其他政治學門次領域或非政治學領域的工作者共同研究，對內整合政治學門各次領域的知識貢獻，對外從事跨領域的研究，也希望本文的寫作能對於政治哲學社群的學科發展的反省，發揮拋磚引玉的作用。

參考書目

- Ackerman Bruce (1980), *Social Justice in the Liberal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all Terence. (1988), *Transforming Political Discours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all, T;,. Farr, J ;. Hanson R. L (eds) (1989) ,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ll Terence. (1995) , *Reappraising Political Theory: Revisionist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arry Brian (1989) , *Theories of Justice*,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Wheatsheaf.

Barry Brian. (1990) , “The Strange Death of Political Theory.” in *Democracy, Power and Social Justice: Essays in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einer Ronald (1992) , *What’s Matter With Liber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itz Charles. (1979) ,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llah, Robert, et al(1985) ,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Harper & Row.

Benhabib, Seyla (ed)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 Contest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Berlin Isaish. (1962) , “Does Political Theory Still Exist?” in P. Lasslett and W.G. Runciman(eds).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1-33 Oxford, Basil Blackwell.

Brisson Susan (1995) , “The Theoretical Importance of Practice”, Shapiro I & Wagner J(eds) *Theory and Practice NOMOS XXXVII* : 216-238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Cobban, A (1953) , “The Decline of Politic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68: 321-7.

Conover, Pamela; Crewe, Ivor, and Searing, Donald (1991) , “The Nature of

Citizen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ish: Emprical Comments on Theoretical Themes”, *Journal of Politics* 53:800-32.

Daniel Norman (1985) , *Just Health Ca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niel Norman (1989) , *Am I My Parents Keep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etz, Mary (1989) , “Patriotism”, in T. Ball, J. Farr R. L. Hanson (eds) (1989) ,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177-9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nn John(1969) ,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nn, John (1989) ,“Revolution”, in T. Ball, J. Farr R. L. Hanson (eds) (1989) ,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333-36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nn, John(ed) (1992) , *Democracy: The Unfinished Journ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workin Ronald(1977) ,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 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workin Ronald (1978) , "Liberalism", in Stuart Hampshire (ed) *Public and Private Morality*, 113-14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aston David. (1951) , “The Decline of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s*, 13: 36-58.

Easton David (1953) , *The Political System*, Knopf, New York, 1953.

Eckersley Robyn (1992) , *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Albany, New York.

Falk Richard (1983) , *The End of World Worder: Essays on Normativ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 Falk Richard (1988), "Manifesting World Order: A Scholarly Manifesto," in Joseph Kruzel & James. N Rosenau, *Journeys Through World Politics*, Lexington Books,.
- Falk Richard (1995), *On Human Governance: Toward a New Global Politics*, Polity Press.
- Goodin Robert (1992), *Green Political Theory*. Polity Press.
- Gunnell John (1987),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The Alienation of Political Theor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Gutmann Amy& Thompson Dennis (eds) (1990), *Ethics and Politics : Cases and Comments*, Chocago: Nelson-Hall Publishers Press.
- Gutmann Amy& Thompson Dennis (1996), *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nson, Russell (1989), "Democracy", in T. Ball, J. Farr R. L. Hanson (eds) (1989),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68-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ld David (1991), "Introduction", in D. Held (eds) *Political Theory Today*. Polity Press.
- Horton John. (1990), "Weight Or Lightne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Its Prospects", in Leftwich (ed) *New Developments in Political Science*.: 126-142,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Issac Jeffrey (1995), "The Strange Silence of Political Theory", in *Political Theory*, Vol 23, No4 : 636-652.
- Jonas, Han (1984), *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
- Lafferty, William M & Meadowcroft, James(eds) (1996), *Democracy and The Environment; Problems and Prospects*, Edward Elgar press.
- Laslett, Peter(1956), "Introduction", in P Laslett(ed),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1st Series. Oxford : Basil Blackwell.

Laslett, Peter (1979)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in Peter Laslett & James Fishkin(eds),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Fifth Series: 35-56.

Laslett, Peter (1992) , “Is There a Generational Contract?” in Peter Laslett & James Fishkin (eds),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Sixth Series: 24-47.

MacIntyre Alasdair(1984), After Virtue,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Mckinnon Catharine A, (1979) , Sexual Harassment and Working Wom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ckinnon Catharine A & Andrea Dworkin (1988) , Pornography and Civil Rights: A New Day for Women ’ s Equality, Organizing Against Porography Press.

Mckinnon Catharine A, (1989) ,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ckinnon Catharine A, (1993) , Only Word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cLean Iain (1989) , Democracy and New Technology, Polity Press.

Miller. D and Siedentop, L. (1983) , “Introduction”, in Miller, David and L. Siedentop (eds) ,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iller David et al (eds) (1987) , 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Miller David (1990) , “The Resurgnce of Political Theory”, Political Studies, 38,421-437.

Mouffe Chantal, (1993) , 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Verso: London New York.

Nagel Thomas (1989) , “What Makes a Political Theory Utopian?”, in Social Research, Vol 56, No4: 903-920.

- Nozick Robert (1974) ,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 Basic Books, New York.
- Nussbaum Martha & Sen Amartya (eds) (1993) , *The Quality of Lif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Nussbaum Martha (1995) “Lawyer for Humanit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ncient Political Thought” in Shapiro I & Wagner J (eds) , *Theory and Practice NOMOS XXXVII*: 181-215,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Okin, Susan Moller (1979) , *Wome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lant Raymond. (1991) ,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Phillips, Anne (1995) , *The Politics of Pres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cock J.G.A (1985) ,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wls, John (1971) ,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awls, John (1987) , “The Idea of An Overlapping Consensus”, in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7: 1-25.
- Ricci David, (1984) , *The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andel Michael(1982) , *Liberalism and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piro Ian. (1990) , *Political Criti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imons John. (1995) , “The Exile of Political Theory: the Lost Homeland of Legitimation”, in *Political Studies*: 683-97.
- Skinner Quentin (1978) ,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 Vol.
- Skinner, Quentin (1984) , “The Idea of Negative Liberty” , in R Rorty, J. B.

- Schneewind and Q. Skinner (eds) , Philosophy in History: 193-2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inner, Quentin (ed) (1985) ,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inner, Quentin (1989) , “The State”, in T. Ball, J. Farr R. L. Hanson (eds)
(1989) ,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 90-13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rauss, Leo (1957) ,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Journal of Politics, 19:
343-68.
- Strossen Nadine (1994) , Defending Pornography ; New York: Schibner Press.
- Taylor, Charles. (1985) , 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 Philosophical Papers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Dennis (1984) ,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Judgement”, in PS,
Vol 17: 195-7.
- Tong Rosemarie (1989) , Feminist Thought: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Westview Press.
- Waldron Jeremy (1995) , “hat Plato Would Allow”, in Shapiro I & Wagner J
(eds) , Theory and Practice NOMOS XXXVII: 138-178,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Walzer Michael (1983) ,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Walzer, M (1989) , “Citizenship”, in T. Ball, J. Farr R. L. Hanson (eds)
(1989) ,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211-21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nz Peter (1988) , Environmental Justice, Albany, New York.
- Williams, Bernard (1980) ,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Analytical Tradition”
in Melvin Richter (ed)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7-75.

Young, Iris Marion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olin, Sheldon (1960), *Politics and Vision*, Little Brown, Boston, Mass.

江宜樺，1994，「族群身份，文化歸屬與政治認同：論當代西方社群主義思潮對臺灣社會認同問題的啓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書。

江宜樺，1996，「邁可·瓦瑟爾論多元族群社會的國家認同」，跨世紀台灣民主發展問題學術研討會，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主辦，台北。

林方孜，1994，「女性主義、認同政治與參與式民主」，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書。

林火旺，1995，「自由主義可否建立一個政治社群？」，江宜樺、陳秀容編《政治社群》：249-270，中研院社科所。台北，南港。

林火旺，1996，「公民身份：認同與差異」，中研院社科所「多元主義」研討會，台北，南港。

施俊吉，1991，「論羅爾斯的差異原則」，戴華、鄭曉時編《正義及其相關問題》：305-315，中研院社科所。台北，南港。

許國賢，1993，《馬克弗森——民主的政治哲學》，東大圖書公司，台北。

張福建，1991，「羅爾斯的差異原則極其容許不平等的可能程度」，戴華、鄭曉時編《正義及其相關問題》：281-304，中研院社科所。台北，南港。

張福建，1996，「自由主義與合理的政治秩序：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初探』」，中研院社科所「多元主義」研討會，台北，南港。

陳思賢，1989，「語言與政治：關於政治思想典籍詮釋的一些論爭」，《政治學報》17：1-30，台北，中國政治學會。

陳思賢，1991，「政治哲學：政治生活的解釋或意識形態之表達」，《政治科學論叢》3:35-63，台北。

陳思賢，1994，「柏克：英國人的自由與傳統中的智慧」，陳思賢著《從王治到共和：古老習慣、自然權利、公民道德與三次英國革命》，台北。

- 陳思賢，1995，「激進輝格與保守輝格的民主理念：潘恩與柏克的對比」，張福建、蘇文流編《民主理論：古典與現代》：21-49，中研院社科所，台北：南港。
- 陳瑞崇，1993，「政治思想史作為什麼？一個生態觀點的序言。」，《東吳政治學報》2：315-349，台北 台灣。
- 陳瑞崇，1995，「論死亡與霍布斯式政治秩序的形成」，《東吳政治學報》4：285-311，台北。
- 黃光國，1995，《民粹亡台論》，台北，商周出版社。
- 黃瑞祺，1996，「理性討論與民主：哈柏瑪斯溝通理論的民主涵義」，中研院社科所「多元主義」研討會，台北，南港。
- 黃 默，1996，《世代之間的正義》，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
- 傅大為，1988，「科學實證論述歷史的辯證——從近代西方啓蒙到台灣的殷海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1-56。
- 傅大為，1990，「從『避秦』到『反依賴』—三十年台灣『人文社會科學』歷史片斷之反省」，傅大為著《知識與權力的空間—對文化、學術、教育的基進反省》：81-93，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楊國樞、文崇一編，1982，《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台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 楊國樞、李亦園、文崇一等編著，1985，《現代化與中國論集》，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葉啓政，1991，「對社會學一些預設的反省—本土化的根本問題」，葉啓政著《制度化的社會邏輯》：1-32，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蔡英文，1995，「邁可歐克秀的市民社會理論：公民結社與政治社群」，江宜樺、陳秀容編《政治社群》：177-212，中研院社科所，台北：南港。
- 蔡英文，1996，「多元主義、政治共識與認同」；發表於中研院社科所主辦「多元主義」研討會，台北：南港。
- 賴澤涵主編，1987，《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台北：

東大圖書公司。

錢永祥，1988，「自由主義與政治秩序」，《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一卷第四期：57-99。

錢永祥，1995，「社群關係與自我之構成：對沈岱爾社群主義論證的檢討」，江宜樺、陳秀容編《政治社群》：297-314，中研院社科所，台北：南港。

錢永祥、王振寰著，1995，「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7-55，第二十期。

戴華，1991，「個人與社會正義：探討羅爾斯正義理論中的『道德人』」，戴華、鄭曉時編《正義及其相關問題》：257-280，中研院社科所。台北：南港。

戴華，1993，「永續發展的規範意義」，《台灣經濟預測與發展》第24卷第1期：63-87。

戴華，1995，「羅爾斯論政治層面上的個人與社群」，江宜樺、陳秀容編《政治社群》：233-248，中研院社科所，台北：南港。

薛化元，1996，《『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台北：稻鄉出版社。

蕭高彥，1995，「愛國心與共同體政治認同之構成」，江宜樺、陳秀容編《政治社群》：271-292，中研院社科所，台北：南港。

蕭高彥，1996，「多元文化與承認政治論：一個政治哲學的分析」，中研院社科所「多元主義」研討會，台北：南港。

Political Philosophy Must Reach out

Mab Huang
Chung-Hong Chen

This essay presents a preliminary argument that political philosophy must reach out if it is to be relevant, vital and lively. New political forces and important issues of our time must be faced up to. Of course, political philosopher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lawmakers and/or executives, yet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y bring their deliberations to bear on public affairs.

In supporting its position, this essay primarily cites the reviv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nations, particularl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970s. The pursuit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its practitioners in Taiwan are gently taken to task. In the concluding part, a few suggestions are made as to the areas of research that should deserve encouragement.

Keywords : political philosophy, relevancy, vitality, public affairs, deliberations.